商事审判的人工智能新路径

刘婧婧

[摘要] 大民事审判格局中商事审判的客观规律及裁判理念尚未达成共识，以“营利性”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作为商事交易价值观的商事审判思维践行不足，冗余的诉讼程序阻碍商事交易效率。理论界提出了若干解决路径，但较少得到回应。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可通过建构人工智能裁判模型，为解决商事审判弊病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关键词] 民商合一；商事审判；人工智能裁判模型

我国商事审判的种种弊病基本业已达成共识，其解决方案学界也纷纷献计献策，但收效甚微，商事审判究竟该走向何方？在信息化的今天，随着大数据的勃兴和超级计算、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的长足进步，人工智能已在多个领域大展拳脚。笔者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我国商事审判提供新路径。

一、商事审判现状及其弊病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尽管相关民商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颁布和修改在持续进行，但商事审判领域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仍层出不穷。自2000年最高院确立了大民事审判格局后，我国民商事审判实践中遵循着统一的诉讼制度。民商不分的法律体系与统一的诉讼制度给日益多样化的商事纠纷裁判带来很大的困扰，进而阻碍了企业营业效率与商业创新。

（一）短缺的商事审判思维

由于很长一段时期实行计划经济方针，我国立法重心在于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对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商法的研究极不发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轫，商法研究才逐步展开，而在此期间我国私法学界对商法普遍关注不足，时至今日，商法的研究在私法领域仍略显稚嫩。在实践中大多数人仍将商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或民法的附庸。^{（1）}因此，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和传统的法学教育，使得我国现行审判的法官们惯用民法和行政法思维，从而导致案件审理的结果背离了商事交易的习惯和本质，为追求表面公平而造成实际的不公平。实践中，法官常以社会公平替代经济公平，这种看似体现社会公平的司法判断，实则破坏了商业规律和程序，严重损害了商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2）}

（二）冗长的审判程序

囿于历史等原因，我国的法院设置并未考虑商事审判。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商事纠纷引起的商事案件越来越多地涌入法院，但我国并未采用国外常用的建立专门商事法庭（院）的模式，而采用大民事格局统一审理。我国现行商事审判除破产、海商外基本没有独立的诉讼程序，商事纠纷多采用或参照适用民事诉讼的程序性规定。商事案件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导致商事案件审理周期的漫长，这与强调时效性的商事经营活动的价值追求不符，也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商事纠纷的重要原因。

（三）僵化的对抗式商事审判模式与强硬的法庭中心主义

现代民商事诉讼中，由于诉讼的对抗机制仍然不够完善，过分强调了诉讼双方的对抗性，如现有的证据制度强化了这种对抗性，诉讼双方挖空心思、竭尽全力藏匿、寻找证据。这种

人为引导、构筑的对抗，进一步破坏了商人之间已经受到伤害的交易关系。另外，不完美的对抗机制使得法官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主要表现在根据证据查清事实的环节），也导致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发挥得不充分。

此外，整个诉讼过程也愈发专业化、技术化，在私法领域的民商事诉讼中，法官和律师俨然成为诉讼的主角，而直接当事人则更像是观众，扮演着“沉默的羔羊”。^{〔3〕}现实生活中，商事裁判结果与双方当事人最终实际达成的处理结果往往大相径庭，有学者称为“反诉讼过程的行为”，^{〔4〕}这无疑宣告这场由法官和律师精心主导的裁判最终没有获得当事人的认同。而且，在严格的庭审中心主义下，当事人如在立案时对法律关系识别错误，错将违约之诉判断为侵权之诉，也将难免被驳回。强硬的法庭中心主义既增加了法官的负累，也影响了司法效率，对商事审判而言更是如此。

二、商事审判弊病的传统消解路径与障碍

（一）立法：构建独立的商事法律体系

商事审判弊病的成因纷繁复杂，既有历史遗留原因，也有理论研究的分歧。商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当下商事审判缺陷的主要原因在于民商不分的立法模式和立法技术，大量民法规范不宜直接适用于商事法律关系，且在复杂多样的商事法律关系面前，我国立法还存在“有法不好用”的司法困境，^{〔5〕}给商事司法的法律适用带来极大的困扰。因此，商法学界极力呼吁：要构建符合商业规律、促进商业繁荣的商事法律规范。

中国需要独立的商事法律体系在商法学界已达成共识，而出台《商法通则》是最为现实的路径，商法学者为之构想了二十多年，并为此展开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目前商法学界对商事立法的研究多停留在对传统大陆法系《商法典》解读与模仿的研究阶段，对当下中国具体商事法律体系的构造、对因日新月异的商事创新而造成的法律适用、对当下中国的商事司法审判关注不足。因此，试图通过构建商事法律体系消解商事审判的弊病在短期内可行性不大。

此外，在私法学界内部“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的民法学者极力主张应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201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民法总则》后，一般认为我国已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总则》在内容构造与规范选择上“复制”了大量如《公司法》的商事法律规范，^{〔6〕}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官方立法模式已经选择民商合一的体例。^{〔7〕}2021年1月1日开始施行《民法典》后，更是对商事法律有关条款进行了有意修正。比如，《公司法》第14条第1款规定分公司的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而《民法典》第74条第2款修正为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又如，《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公司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物权法》第106条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而《民法典》第65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从上述条文的先后顺序看，对第三人范围的表述变化应该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应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为合理。^{〔8〕}

商法学界试图通过构建民商区分的商事法律体系之路在如今看来似乎已无可能，因此转而走向求同存异：如何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之下确立商事法律规范，并予以合理安排，这无疑又是一个新的开创性难题。

（二）司法：构建商法思维指导下独立的商事审判模式

在民商合一的大背景下，商事立法体系化进展十分缓慢。因在立法上难有推动，有学者提出重构商事审判制度，呼吁在审判上实现商事独立，从而在司法实践上实现“曲线救国”。商法学者详实地就商事审判独立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阐发；提出组建专业的商事审判队

伍（法庭），探讨了商人进入商事审判的可能性；并详细地从案件管辖权、自由证据制度、案件审限、律师强制代理、再审制度等多个维度重构了商事审判过程中诉讼与非诉活动的具体审判制度。^{〔9〕}但实践中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的进展却背离了学者们的期望，而大民事审判格局愈发明显。此前，民二庭是民事审判庭中最具有商事审判专门组织的属性的法庭，但在最新一轮的法院组织调整中，这一属性正在消逝。因此也不难推断，商事管辖权、证据制度等具体的诉讼程序更加不可能纳入立法规划。

此外，实务界、理论界对商事审判的法官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商法思维”指导商事审判。法官在审理商事案件的过程中，应注意发现商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进而发现并尊重商法的特殊性，在商事审判中把蕴藏在商法中的理念、思维等显现出来，并最终内化形成商事审判的理念和思维。^{〔10〕}在碰到具体的纠纷时，由法官来判定涉诉案件的本质是否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而受民法典的调整。^{〔11〕}

诚然，法官遵循商法思维，并以此裁判便可实现商法的价值理念，促进商事行为的发展，激发商人的创新。但商事法官们普遍不具备商法思维是商事司法实践中含混的最直接原因。商事立法研究还尚处朦胧之中，如何指导法官实现思维的转变，如何将商法思维灌输到法官的头脑之中，实现从理论到实务的“复制、粘贴”，就变得极为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行。思维是对问题进行思考的方法论，其形成过程尤其复杂，试图让法官在短时间内拥有商法思维是不切实际的。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曾对商事裁判规则的构建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付诸实践。立法上，民、商纷争不断，无法达成共识；司法上，通过法官裁判思维的灌输以及审判制度的构建均不具有现实的操作意义。

三、人工智能新路径对商事审判的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4月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中指出，要加快法院管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平台建设工作。同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实现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智能化。如前所述，我国商事立法与审判之弊病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并提出了有关对策，但收效甚微。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下，学者的设想或将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示和执行，传统商事审判的弊病将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消解。笔者认为人工智能新路径对商事审判将在如下四个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一）高速的存储运算能力，提升审判效率

在人工智能司法环境下，非事实性任务将变得程式化、模块化，使得商事审判的全过程都将实现智能化处理。在以程序性工作为主的立案阶段，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程序性事务可大幅度加快立案效率，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材料审核、案件归类、案由概括等服务。具言之，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提示当事人缺少的材料并提示补正；可实现法律关系识别，从而避免当事人因此而不被受理；可依据案件复杂程度与案件类型实现自动分案，智能匹配合适的法官。在庭审、裁判阶段，人工智能审判系统利用其在记忆、存储和程序性工作的强大优势，简化案件的审判程序和流程，如在证据交换、举证质证等过程中能大幅度减少流程与时间，提高审判效率。

（二）暗合诉讼论证的本质逻辑，保障裁判公平合理

商事审判过程中，强调严格审判中心，法官传统的三段论为法律推理模式即基于规则的推理有着重要弊端，即忽视了诉讼论证的动态性、交互性、多主体性、开放性和可废止性。诉讼论证的可废止性是指随着诉讼博弈过程的发展，其前提集中元素的增减使得论证者拒绝原来的法律结论。^{〔12〕}在传统的诉讼过程中，法官的说理过程只处理证成结果或与之相关的

理由（证据），即理论上法官须说明不存在更好的替代方案裁判，方可证明其审理过的完全合理，亦即法官同样要建立在拒绝相关替代方案的理由基础上，故法官的这种选择是“非完全证成”的。但囿于法官的智识储备与计算能力是不足以完成全部可能性的排除，即法官所作判决仅具有高度盖然性。但人工智能技术可使得商事审判从单一性论证逐步发展为多种推理模型相结合的深度学习树，从而提升预判结果的准确性，并以相对统一的推理、评价标准为法官提供裁判参考。

（三）相似案例的自动呈现，保证类案同判

我国作为严格的成文法国家，对案例的适用有着严格的要求，并不能作为法官援用的正式法律渊源。但在商事关系中，商事判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有学者呼吁应当将商事判例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予以采用。上海高院开发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代号“206工程”）第二阶段——民商、行政裁判辅助系统已交付使用。该系统由法律规则库、语义分析模块、案件裁判模块构成，并将证据标准嵌入其中，再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跑测海量司法数据，实现在法官办案过程中根据案情分析，自动推送相似案例，为法官提供统一的法律适用、裁判标准。

“同（类）案同判”是司法审判的基本要求，人工检索“类案”效率低、数量少、成本高；而信息化技术的加入则发挥高效、快速的存储运算能力，辅之人工智能模型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呈现相似案例，并提供有关法条和裁判标准，实现统一的裁判标准。

（四）柔性的审判模式，缓和商事交易关系

我国目前民商一体化的审判模式中，是以审判为中心的法律审判过程，对起、应诉双方的论证关注不足，但法律的可靠性从来不是法学家论证出来的。^{〔13〕}以法官为中心的商事审判模式下，起、应诉双方当事人参与度较低，裁判结果也可能并非实际纠纷解决方式，这显然恶化了诉讼中的商人关系，不利于商人和平解决纠纷，应当进行“柔性化”改革。

四、结语

当前，我国商事审判立法上民商不分的立法模式导致“有法不宜用”和“有法不好用”的弊病，司法上商事审判思维也践行不足，法律人工智能为商事审判提供了一条消解之路。人工智能业内常言，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这里的“人工”不仅包括如对数据进行标注的“技术性人工”，也包括为司法审判活动提供更加精致和深厚法学理论的“理论性人工”。法律人工智能的研究理应有、也必然有法学者的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安徽中皖律师事务所

参考文献：

- [1] 赵万一：《商法的独立性与商事审判的独立化》，《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
- [2] 叶林：《商法理念与商事审判》，《法律适用》，2007年第9期。
- [3] [4] 蒋大兴：《商事审判何须对抗——商事审判“柔性”的一面》，《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 [5] 王建文：《中国商法的理论重构与立法构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页。

[6] 王利明：《民商合一体例下我国民法典总则的制定》，《法商研究》2015 年第 4 期。

[7]全国人大常委会李建国副委员长在 2017 年 3 月 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我国民事立法秉持民商合一的传统，通过编纂民法典，完善我国民事领域的基本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沈德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上）》，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7 年，第 38 页。

[8]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第 12 页。

[9] 范健：《商事审判独立性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赵万一：《商法的独立性与商事审判的独立化》，《法律科学》2012 年第 1 期；樊涛：《我国商事审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河北法学》2010 年第 2 期。

[10] 王保树：《商事审判的理念与思维》，《山东审判》2010 年第 2 期。

[11] 郑彧：《民法逻辑、商法思维与法律适用》，《法学评论》2018 年第 4 期。

[12] 熊明辉：《诉讼论证——诉讼博弈的逻辑分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94 页。

[13] 陈小文：《程序正义的哲学基础》，《比较法研究》2003 年第 1 期。